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馆藏墓志拓片精选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

墓志拓片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馆藏墓志拓片精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墓志拓片精选》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丹
编 委 陈晓和 李仓钧 李秀娟 石 奕 滕艳铃 于连成
葛怀忠 徐士泽 臧瑞平 贾瑞宏 计小林 赵 端
策 划 于连成
撰 稿 王莘莘
拓 片 计小林 贾瑞宏 郭继华
摄 影 赵 端
封面设计 周海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墓志拓片精选 / 北京石刻
艺术博物馆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402-3021-0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墓志—拓片—北京市—
古代 IV. ①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2188 号

责任编辑 夏 艳 俞 伽
内文设计 北京双子山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010-63587071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7
版 别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3021-0
定 价: 180.00 元

目录

北京地区出土墓志及研究简述 第壹页

唐代墓志 第壹拾壹页

- 唐郭君墓志并盖 第壹拾贰页
- 唐王徽墓志并盖 第壹拾肆页
- 唐高元表墓志 第壹拾陆页
- 唐田处琼妻阳氏墓志并盖 第壹拾捌页
- 唐周筠妻刘氏墓志 第贰拾页
- 唐王时邕墓志并盖 第贰拾贰页
- 唐宋再初夫人蔡氏墓志并盖 第贰拾陆页
- 唐温令绶合祔墓志并盖 第贰拾捌页

辽金时期墓志 第叁拾壹页

- 辽韩侁墓志 第叁拾贰页
- 金李抃墓志并盖 第叁拾肆页
- 金故乌古论元忠墓志并盖 第叁拾陆页
- 金故鲁国大长公主墓志并盖 第叁拾捌页

目录

明清及民国墓志 第肆拾壹页

- 明李顺墓志并盖 第肆拾贰页
- 明郭玗墓志并盖 第肆拾肆页
- 明刘辅母吴惠金墓志并盖 第肆拾陆页
- 明杜俊夫人尹氏墓志 第肆拾捌页
- 明黄彭年墓志并盖 第伍拾页
- 明太监龚昇墓志并盖 第伍拾贰页
- 明闫整母王氏墓志并盖 第伍拾肆页
- 明郝儒暨妻戴氏合葬墓志 第伍拾陆页
- 明王泽暨妻苏氏合葬墓志并盖 第伍拾捌页
- 明郑承恩墓志并盖 第陆拾页
- 明郑承宗墓志并盖 第陆拾贰页
- 清黑舍里氏墓志 第陆拾肆页
- 清纳腊卢氏墓志 第陆拾捌页
- 清王熙墓志并盖 第柒拾页
- 清觉罗淑慎墓志并盖 第柒拾贰页
- 清纳兰揆方墓志并盖 第柒拾肆页
- 民国王妙如女士墓志并盖 第柒拾陆页

后 记 第柒拾捌页

北京地区出土墓志及研究简述

墓志是自汉魏南北朝以来出现的一种重要随葬品，是随葬在墓室中标明墓主身份的一种石刻，记述了墓主的姓名、生卒年月、家世、生平事迹以及下葬时间、地点，并具有一定形制、文体和行文格式。《新中国出土墓志》总叙曰其为：“形制起源于秦汉，变化于魏晋，定型于南北朝，兴盛于隋唐，经宋元明清发展，至民国仍然行用。”与墓志在形制、内容上最接近者为墓碑，其使用年代却早于墓志，可见墓志的定型受汉代墓碑影响极大。定型后的墓志铭文与碑文之区别在于除记述墓主本人一生功德外，对其家族祖先世系以及后嗣、亲属关系的记录更为详尽，这与北朝、隋、唐讲究门第，推崇士族大姓有关^①。此后的墓志内容基本延续着这种记录方式，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状况，往往能从不同侧面补证史料之不足，也因此成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以目前资料“估计历代墓志的存留数字将超过万件”^②。

北京地区目前出土的墓志逾千方，除少部分传世品外，大多为1949年建国以后出土。主要集中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各区县文物管理部门也有一些收藏。北京文物工作队于1964年编辑了《北京市出土墓志目录》第一编，收录了工作队自1951年至1964年在配合本市基本建设过程中发掘出土的墓志，共计151方，墓志年

代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至清乾隆十年（1745年）。《北京文博》自1996年第一期至1998年第三期分十次刊载了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所藏北京地区出土的墓志拓片，共计304件，其中唐以前40件、辽金元27件、明代206件、清代26件、民国2件。2003年，列入1982年至1986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出版，该书由中国文物研究所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联合编辑，收录建国后北京地区出土墓志411方，这些墓志出土地点分布广泛，除现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之外，还藏于朝阳、海淀、丰台、顺义、昌平、门头沟、通州、房山、大兴、怀柔、平谷、密云等区县。以上三项是目前单独集中收录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的目录性书刊。

近年来见诸各种刊物，利用北京地区出土墓志作为资料，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研究者越来越多，使墓志这种石刻品类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北京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现根据所见发表文献，简略述及北京地区出土墓志及研究成果。

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以前墓志不多，以现存首都博物馆的西晋永嘉元年（307年）的《华芳墓志》年代最为久远，该墓志1956年7月出土于石景山区八宝山西。墓志为碑版形，尚属早期墓志形态。罗振玉《实交录》卷二云：“晋人墓志皆为小碑，直立圻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

《华芳墓志》其形符于罗氏之说，墓志从碑版形转化为盃顶盒式，因受其他冥器形制的影响，到南北朝时形制才基本定型。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西晋《管氏夫人墓志》亦为碑形，属碑碣演变为墓志的过渡样式，《华芳墓志》的出土无疑又为此期墓志形制增添了又一例证。《华芳墓志》四面连文环刻，存 1630 字，古隶书体，无撰文、书丹人。志主华芳为西晋幽州刺史王浚之妻，王浚在晋武帝死后的“八王之乱”和“十六国”时期，利用鲜卑、乌丸骑兵攻占、剽掠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幽州百姓深受苦难。《晋书》称其为“为政残暴”、“黔庶荼毒”。其妻华芳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实物史料。志文曰：“今岁荒民饥，未得南还，辄权假葬于燕国薊城西廿里。”此记是迄今北京地区出土墓志中，对于薊城方位的最早记载，研究者利用墓志及同时出土的骨尺一并研究，为确立晋时薊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较准确的史料。对《华芳墓志》之研究可见《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清理简报》^③、《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释文》^④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について》^⑤。除《华芳墓志》外，据《北京考古四十年》记，1983 年底在石景山老山南坡下，发现西晋墓一座，该墓出有永嘉元年（307 年）迁葬于此的姑、叔、侄三人墓志，志记三人皆不足周岁即亡。北京出土较早的墓志还有北齐武平二年（571 年）的《傅隆显墓志》，该墓志 1963 年 3 月在怀柔县韦里村出土。艾叶青石质，盃顶式盖，未镌字。志石长 52 厘米，宽 22 厘米，书：“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十一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渔阳郡功曹二代郡正解褐平北将军幽州治中土垠雍奴路渔阳四县令傅隆显铭。”与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红色刻字砖二块，其一上刻“安太二年傅隆显铭”，另一上刻“记”字，此为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北齐墓志。

目前所见资料记载北京出土的隋以前墓志仅见于上。从墓志使用发展过程看，隋唐时期是墓志的盛行期，在书法、文体、雕刻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高峰，上自王公宦宦、下至庶民百姓，在墓葬中埋设墓志极为普遍。但北京出土的隋代墓志却不多，

1987 年北京市怀柔县迎宾南路西侧出土了《李始妃砖志》，砖志题：“大隋开皇十二年二月六日昌平县常盈乡侯惠阪妻李始妃铭”，书体不正规，为随手刻镌，笔画浅细，不具典型墓志特征。但 1992 年 7 月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出土的韩智、韩辅墓志却弥补了北京隋代墓志出土较少的缺憾。《韩智墓志》为隋开皇九年（589 年），《韩辅墓志》为隋仁寿元年（601 年）。二人为父子。韩智，字子哲，曾祖韩合，曾任北魏中坚将军、乐陵郡守；祖韩据，为长平县令；父韩琬，为清河太守。韩辅，字仲卿，曾任主簿、司功。如此可称宦宦世家，但未见史籍有载，对其所望亦不见载，时韩氏郡望主为昌黎。有学者结合北京出土的《辽韩佚墓志》，认为韩氏确有燕国郡望，且也源出昌黎，从而可补史载之不足^⑥。此外，《韩辅墓志》称其：“更心易志，慕求大道。舍己珍物，劝导乡亲。为造一切经，并作经藏。”此说如与房山云居寺刻经历史联系考查，幽州智泉寺僧静琬于白带山发愿刻造佛教经典是在隋大业中（605—611 年），而《韩辅墓志》所记，“劝导乡亲，为造一切经，并作经藏”，最迟也在隋仁寿元年（601 年）之前，比静琬刻经要早数年。由此可见，房山刻经其时之状况。

唐代墓志在北京地区的出土相对较多，大约在 80 方左右。我馆目前所藏墓志拓片有 51 件。时间自唐上元三年（676 年）至唐天祐四年（907 年）。唐志志文中所保留的大量北京历史地理变迁记录，给考古工作者利用出土墓志及相关史料，结合实地考古调查，对唐幽州城址与城坊，以及郊区乡村的复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对唐时幽州城地理位置及下辖乡村的研究成果显著。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唐件钦墓志铭》于 1929 年出土于中国大学（今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教育部），同年 10 月 19 日即见于《北平晨报》，常慧、王宪章和傅振伦分别发文《中国大学发现唐墓调查报告》和《中国大学唐件钦墓之发掘》，后编入《北平金石目》，罗振玉又将其收入《墓志征存目录》。该墓志是北京地区迄今最早发现记录唐幽州历史的墓志铭，也是

记载唐太宗以幽州为基地,东征辽东及高丽等地区的实物资料。

唐代墓志中对志主宅邸、葬地的记述详细,是确定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据,因此极受研究者的重视。赵其昌先生的《唐幽州村乡初探》^⑦和《唐幽州村乡再探》^⑧二文,利用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共计40余方,对唐代幽州的村乡进行了详细考证,确认幽州所辖蓟县所属有燕夏乡海王村、甘棠村;会川乡从善村、邓村;燕台乡东岗、高义村;广宁乡鲁村、姚村;归仁乡李曲村、刘村和幽都县所属丰乐乡;幽都乡石槽;正统乡胡堡;礼贤乡龙道村、别驾村、黄城、刘村;房仙乡庞村;大保乡杜村、樊村;归义乡;太平乡件村、万合里;相公乡显固村;美锦乡南四村;效德乡姚村;展台乡共计十六乡24村,其中依据墓志所记能确定具体位置者为十一乡。并绘有“唐幽州村乡图示”,考证虽距史籍记载还相差尚远,但我们今天了解乃至复原幽州村乡地理位置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鲁琪先生的《唐幽州城考》^⑨一文,利用出土唐辽时期墓志28方及相关史料,对幽州城四垣及城内二十六坊进行了考证,以墓志所记对应宋代路振《乘轺录》所记幽州城坊数相吻合。后又有多篇关于此题目之研究,《唐幽州村乡补缀》^⑩对赵其昌先生的研究加以肯定,认为其重要意义还在于为历史地理研究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村落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该文还就已掌握的材料,引用出土墓志所载信息,对幽州村乡进行了补缀。《唐幽州诸坊考》^⑪除利用原出土墓志外,还使用了近二十年来新出土的墓志,再次对幽州二十六坊重新进行考证,纠正了过去不够准确的记述。又《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⑫亦属此类。

1956年永定门外安乐林村大公报宿舍工地曾出土《唐姚子昂墓志》,载墓主墓地“左带梁河,近瞩东流之水,右临城廓,西接燕王之陵”。有学者考证此“墓志早于金大定三百八十年,记载了燕王陵在幽州城之东南,志文与郦道元《水经注》、《金史·蔡珪传》所记燕王陵方位相吻合。由此观之,汉两燕王陵由汉、北魏、唐、辽直至金大定九年,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皆

在蓟城(唐幽州城)东南,其位置未变。姚子昂墓志的出土为研究汉蓟城、唐幽州城、金中都城,以及燕王陵、高粱河故道的历史地理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⑬。

唐时北京地区为北方重镇,在安史之乱前为范阳节度使治所,安史之乱后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治所。从出土墓志中可见涉及时任幽州镇重要官员者颇多。馆藏墓志拓片中所涉及的就有时任幽州市丞骑都尉王道、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刘如泉、监察御史里行王仲堪、卢龙节度掌书记监察御史王叔平(王仲堪弟)、平州卢龙府折冲都尉孙如玉、银青光禄大夫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上柱国中国公蔡雄、奉议郎前守瀛州长史赐绯鱼袋摄檀州长史李藤、瀛州司马陞邑安平范阳县令幽州节度押衙兼侍御史王郢、衙前散将游击将军守翊府中郎将和元烈、朝请郎试太子洗马赐绯鱼袋蓟州司仓参军李洪、卢龙节度驱使馆驛王府参军朱方道、妫州怀戎县令杨麟、卢龙征马使游击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金鱼袋曹朝宪、檀州司兵参军窦少文(曹朝宪志撰文人)、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王时邕、前卢龙节度驱使官宣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贾喧(王时邕志撰文人)、幽州节度两藩副使朝散郎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绯鱼袋华封輿、游击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臚卿纪公、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卢龙节度留后营府都督柳城军使平州诸军使平妫等州刺史上柱国王公淑、涿州范阳县主簿萧公、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周屿、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藩副使摄蓟州刺史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建章、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赵从一、幽州副将孙英、幽州节度衙前讨击副使太中大夫试殿中监温令绶、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韩宗德、事兵马使充使宅将副将茹弘庆、幽州度押衙摄纳降军营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侯元知、妫州刺史充清夷军营田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司封郎中摄御

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刘钤、卢龙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郑隼（刘钤志撰文）及信州刺史薛府君等。如此众多的任职官员墓志，反映了志主身份的复杂，几乎涵盖了唐代幽州地方官员的各阶层。对此《试论北京唐代墓志的地方特色》^⑭一文总结了三点，于此不再赘述。

《唐幽州经济的佐证——两墓志考辨》^⑮一文利用《唐王叔原墓志》和《唐范阳卢公夫人赵氏墓志》对唐朝后期幽州地区的经济形式进行考察，以为王叔原充沽河大使增加军府税收和张钤飞狐铸钱缓和危机，是“安史之乱”后幽州地区经济衰退的反映。认为藩镇割据的局面使幽州的节度使在政治、经济上可以左右政局，并已影响到唐王朝的大一统，使唐王朝逐渐走向衰亡。此两墓志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北京经济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这也是对唐代历史资料的有益补充。

此外在北京出土的唐志中引起注意可提及者有《王仲堪墓志》，该墓志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北京广渠门内安庆义地出土，先归翁树培度藏。清嘉庆间翁氏赠与大兴徐松，道光十七年徐松移置崇效寺。其变迁之始末，徐松在志石下方及另一石分别镌跋和道光十七年（1837年）题记。

《王道墓志》2000年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出土。志主王道，唐乾封元年（666年）任县录事，后迁任州仓历、州录事，上元元年（674年）任州郊丞。上元三年（676年）九月六日终，葬于蓟城南三里平原礼。提及此志是因志盖雕琢精美，四坡减地平级对称如意形缠枝卷草纹饰，在北京出土墓志中较为少见。

《王时邕墓志》1985年5月北京丰台区槐房乡出土，志载墓主唐会昌六年（846年）葬。值得重视的是该墓志盖背面镌有《释迦牟尼佛画赞并叙》残碑文，仅残存21行439字。碑记国子监书学博士王南金词，押官于乾育、路奴子、李怀岳、李景澄等刻建于唐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八日。史载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七月灭佛，志主王时邕于同年十一月

病逝，次年三月入葬，家人正是利用了未加磨砢的这通佛教碑石改制成了墓志盖。据志主葬年和志盖残存碑文推断，《释迦牟尼佛画赞并叙》碑应为历史上“会昌灭佛”之遗物。洪欣先生《唐〈王时邕墓志〉、〈阳氏墓志〉考》^⑯一文对此有详细考释。

《张建章墓志》1956年11月在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东出土。志石双面镌文，背面刻志主官衔及迁葬年月。张建章唐大和七年（833年）曾出使渤海国，著有《渤海记》一书，墓志为了解唐廷与渤海国的关系及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史料，于此墓志考证者就有三文，即徐自强先生作《张建章墓志考》^⑰、佟柱臣先生作《〈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⑱、赵其昌先生作《唐〈张建章墓志〉续考》^⑲，足以说明此志之重要。

综上所述唐代墓志中所涉及的北京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丰富，目前学者利用墓志进行幽州地理位置研究者较多，并取得了突出成果。对幽州其时所设节度治所的研究亦有涉猎，相信随着对出土唐代墓志的不断深入研究，定会给北京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硕果。

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元时期墓志相对较少，我们所见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墓志51方，其中辽代21方，金代21方，元代9方。今北京地区曾为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特别是辽、金时的燕京是真正的契丹政权、女真政权的统治中心，京畿之地多官吏、豪族墓地不足为奇，元人苏天爵就曾说：“辽、金墓多在京畿。”以现今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墓志也可证此。北京地区出土的这一时期家族墓志较为丰富，如韩氏家族墓志共七方，即辽韩佚、韩佚夫人王氏、韩资道、王师儒、王师儒妻韩氏、丁文道以及金代韩诩墓志；张氏家族墓志五方，即张琪、张俭、张嗣甫、张馆、张岐墓志。

以北京出土的辽、金两朝韩氏家族及与韩氏有亲戚关系的墓志为例，齐心先生以其六盒墓志为依据，结合历史文献初步搞清楚了从韩延徽之父韩梦殷起至韩汶止十代的家族成员关系及名字、官职。其文《〈辽代汉臣世系表〉补证——略论辽金幽州地区韩延徽族世系》载于《首都博物馆丛刊》1982年第

一期。后又有陈康先生《杜恂与韩氏家族》²⁰和《辽杜恂墓志补证》²¹二文，对杜氏家族及与韩氏家族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可视为是对韩氏家族世系的补证。

1980年在北京丰台区米粮屯村出土了金代《乌古论窝伦墓志》、《乌古论元忠墓志》和《鲁国大长公主墓志》，此三盒家族墓志极为重要。乌古论氏为金代女真重要部族。元忠部族协助完颜氏建立金政权，为女真皇室所器重，有三代“世为姻亲，娶后尚主”的关系。乌古论窝伦尚太祖第二女毕国公主，由此拜驸马都尉。卒后加赠金紫光禄大夫；赠其父为银青光禄大夫；赠其祖为光禄大夫。育有四子，其第四子即元忠，尚世宗女鲁国大长公主。窝伦墓志的撰文、书丹及篆盖者，《金史》中皆立传，被世人所熟者为篆者党怀英，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世称“党承旨”。擅书法，尤爱玉箸篆书，堪称“独步金代”。泰和四年（1204年），书“泰和重宝”，铸于钱币之上，是为“金泰和”。乌古论元忠墓志载：元忠，小字讹里也。十岁时，因仪冠颖异，为金世宗择为长公主婿，并育于邸中六年。大定二年（1162年）加驸马都尉，三年（1163年）迁左卫将军，至六年（1166年）迁右副点检，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任尚书右丞相，二十五年（1185年）被罢相，后明昌二年（1191年）加开府仪同三司，知广宁府，承安二年（1197年）改彰德尹。鲁国大长公主则是金世宗长女，明德皇后所生，下嫁开府公元忠。大定初始封豫国长公主，章宗继位，进封为鲁国大长公主。由赵福生、王武玉、袁进京撰文的《金代乌古论窝伦、乌古论元忠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²²一文，对乌古论元忠之部族与金皇室的关系、乌古论窝伦家族世系、元忠生平及三位志主生卒年等问题都进行了考证，认为此家族墓志可与史互证、纠史之误、补史之缺。

除家族墓志外，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时期较为重要的墓志还有1959年北京丰台区永定门外马家堡洋桥村发现的北平王赵德钧及妻种氏合葬墓中出土的《辽故赵德钧妻种氏墓志》，墓主赵德钧五代时任北平王，长期镇守幽州，在保卫建设幽州、

抗击契丹南侵中有一定建树。《后唐北平王赵德钧》²³一文，用墓志所载内容结合史料，对赵德钧生平和墓志所涉及地理位置、家庭成员等问题给予了论述。

2000年4月北京丰台区丰体南路出土《辽故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志主李继成，字孝廉，辽代汉臣石昉之外孙。此志有《辽代〈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铭〉考释》²⁴一文，据志载对墓主、先辈、仕历、姻亲、后代及墓志所提地名等问题进行了考释，是了解辽代职官、家族姻亲及地理位置的重要史料。另一篇关于辽墓志的研究文章是任秀侠的《辽郑颀墓志考》，文见《北京文博》2003年第四期。

利用墓志对辽燕京历史地理研究者有《辽南京〈燕京〉村乡指辨》²⁵，文章利用出土墓志多方并结合其他史料，对志中所记燕京所辖村乡进行了考辨。

1956年9月百万庄二里沟出土了《金张汝猷墓志》，侯鄂先生遗作《金〈张汝猷墓志〉考释》录于《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文章结合史料对张氏的家史和官职、家属及戚友、地理等问题加以考证，谓张汝猷为金首相张浩之子，曾娶世宗的元妃李氏之妹，有外戚关系。此志简缀始末，可为金史、渤海国史及北京史的参考。

1975年8月北京通县南三间房出土了《金故石宗璧墓志》，志载石宗璧娶女真人纥克石烈氏为妻，由管理酒税的官吏升为显武将军管理边政。志石可为研究金代守边制度、军事制度、社会经济状况及汉人与女真人通婚情况的例证。

北京地区出土的金代墓志较重要的还有《蒲察胡沙墓志》，墓志于1978年9月出土于海淀区香山附近娘娘府建筑工地。《金蒲察胡沙墓志铭考释》²⁶就墓志内容作了详细考释。蒲察氏为金代“黑号之姓”，是金代的贵族和外戚之一。蒲察胡沙祖父蒲察按不尚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妹韩国大长公主，其女又嫁与金太祖完颜阿骨之子睿宗完颜宗辅，也因此被金世宗“赠太尉、曹国公”，并追封其祖。志主蒲察胡沙本人尚金世宗第三女菀国长公主，成为驸马。此后一路官运亨通，一生所任重要职位

有“殿前左副都点检”、“左宣徽使”、“兵部尚书”、“河南路兵马总管兼南京留守”等。该墓志的出土，无论对金代女真史的研究还是对北京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发表的金代墓志考证还有《金代赵公墓志考》²⁷，墓志2002年3月在石景山游乐园东侧五环路工地出土。文章对志主赵励的家族、世系以及辽代科举制度、北辽、金克汴京、金代宛平乡里建置等问题提出了见解。

北京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元代墓葬是1998年9月19日在颐和园公园内昆明湖东岸发现的耶律铸墓。2004年4月在正阳门举行了元左丞相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文物展，王丹、王策合撰了该展的巡礼一文²⁸，对展览进行了介绍。墓中出土的《耶律铸墓志》及《耶律铸夫人奇渥温氏墓志》无疑是北京出土的最为重要的元代墓志，二方墓志均为圆首碑形。《耶律铸墓志》额篆：“故中书左丞相耶律公墓志铭”；首题：“大元故光禄大夫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耶律公墓志铭”。夫人《奇渥温氏墓志》额楷书：“故郡主夫人奇渥温氏墓志铭”，首题：“故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监修国史耶律公郡主夫人墓志”。志主耶律铸为契丹皇族的后裔，据墓志等史料，可追溯到其九世祖耶律倍。其父耶律楚材是元初重臣，铸为其次子。耶律楚材卒后，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按志载历加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改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荣禄大夫中书左丞相，迁光禄大夫平章政事监修国史，拜光禄大夫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等职。墓志是了解、研究耶律铸本人、家庭和家族世系的重要史料。耶律铸夫人志载，奇渥温氏，小字瓚贞。斡真大王女孙，捏木儿图大王幼女，塔察儿大王从妹，生耶律希援、希崇、希晟。昔宪宗蒙哥崩于钓鱼山后，世祖立，世祖弟阿里不哥叛乱，耶律铸“弃妻子”自朔方归世祖，世祖遂以其忠于王室而在是年将奇渥温氏下嫁，时奇渥温氏“甫及笄年”。夫人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三月六日卒，卒年三十三岁。耶律铸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四月十二日卒，同年七月十五日与奇渥温氏同“葬于甕山之阳中书令之地次”。墓志关涉到元朝宗室的姓氏、耶

律氏家族与蒙古贵族的婚姻关系等几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对研究元代社会政治、物质文明、社会文化、民族习俗均有重要意义。

《铁可墓志》于1962年12月在北京崇文区法塔寺东龙潭湖北吕家窑村出土。志盖盃顶式，顶部没有镌题，盖内续刻志文。蔡文渊撰文，刘赓书丹。铁可为元初辅佐忽必烈之重臣，历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官至太傅、录军国重事。志文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国名、地名、人物、信仰、宗教活动及元朝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是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有文《元〈铁可墓志〉考释》²⁹对墓志所载内容进行了研究，认为此墓志可与史互证、补史之缺。文章还对墓志涉及的官职、寺庙、地名及志主后代进行了考证。

《张弘纲墓志》于1972年5月在北京朝阳区永定门外小红门村出土。梅宗说撰文，赵孟頫书丹，方回篆盖。志主元初与父张禧在辅佐忽必烈征讨八百媳妇国的战役中屡建战功，成为忽必烈的重臣。大德九年（1305年）葬于大都南二十里中曈先茔之兆（今永定门外小红门一带）。黄秀纯的《元代张弘纲墓志及其事迹考索》³⁰对志主生平及家世、墓志所涉及的地理位置、书丹人等内容进行了考证。谓书丹人赵孟頫所书碑版作品多在延祐年间，取法李邕，书于大德之时的不多见。此志字体严密峻整，峭劲秀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

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墓志数量最多，约三百余方。志主上至皇亲国戚，下至京城百姓，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尤以皇族、外戚及太监墓志相对较多，明显带有国都的色彩，是研究明代宫廷史的重要史料。依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辑的《北京考古四十年》一书，对出土的明代嫔妃圹志、外戚墓志及太监墓志做如下梳理。

明代妃嫔墓葬在北京有两处，一在昌平十三陵陵园内，一在西郊金山。葬于金山的还有明代诸王及公主，《长安客话》中载：“凡诸王、公主夭殇者，并葬金山口，其地与景皇陵相属。又诸妃亦多葬此。”1951年8月至11月在董四村妃嫔墓天启帝的妃子墓中出土了张裕妃、段纯妃、李成妃三盒圹志；

万历帝的嫔墓中出土了张顺嫔、耿悼嫔、邵敬嫔、魏慎嫔、李荣嫔、李德嫔、梁和嫔共七盒圹志。1963年在厢红旗营成化帝的妃子墓中出土了庄静妃王氏、庄懿德妃张氏、和惠静妃岳氏三盒圹志。《明代妃嫔陵园及圹志》^③一文，根据出土的嫔妃圹志对明代妃嫔制度和宫廷生活进行了探索与研究，订补了有关历史典籍。此十三盒嫔妃圹志是明史研究中罕见而难得的实物资料。

2000年4月，石景山文物管理所在刘娘府门诊部征集到《光庙恭懿庄妃圹志》，苗天娥据此成文《光庙恭懿庄妃圹志略考》^④，对庄妃李氏进行了详细研究，分抚视崇祯、功不可没；远离祸乱、仁慈无争；持正不阿、愤郁而薨三部分给予李庄妃一生恰当的评述。

除上述所说嫔妃圹志外，1953年至1954年在镶红旗董四墓还出土了诸多公主、皇子墓志。如：《沅怀王圹志》，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葬，1953年海淀区厢红旗董四墓出土。沅怀王朱常治，明神宗朱翊钧第四子，万历十五年（1587年）九月生，郑贵妃出，一岁而殇，追封谥为“沅怀王”。1954年海淀区厢红旗董四墓出土了明熹宗朱由校二公主的圹志，一为《永宁公主朱淑娥圹志》，她是熹宗的长女，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生，范贵妃出。天启三年（1623年）七月薨，同年葬，追封谥为“永宁公主”。另一为《怀宁公主朱淑瑛圹志》，她是熹宗第二女，天启四年（1624年）二月生，李成妃出，当年六月即薨，追封谥“永宁公主”。《明史》对二公主记载不详，可补史之缺。

明代外戚墓志出土有1957年右安门外彭庄出土了《万贵夫妇墓志》，万贵为明宪宗成化帝宠妃万贵妃之父，历锦衣卫指挥使。1961年在南苑苇子坑出土正德年间《夏儒墓志》，夏儒明武宗毅皇后之父；1977年在八里庄慈寿寺塔西一公里处出土了万历年《李伟夫妇墓志》，李伟明神宗生母李太后之父，封武清伯，进武清侯。我馆藏品中属外戚者有《钱雄墓志》，其姑母是明英宗孝庄睿皇后钱氏；《陈善言暨元配宋宜人墓

志》，陈善言是明神宗孝安皇后之兄；郑承宗家族墓志，郑承宗的侄女是神宗皇贵妃郑氏。这些明代外戚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外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提供了帮助。

明代太监墓志在北京出土的数量可观，资料显示自1955年至1984年北京地区发现的明代中晚期太监墓葬近百余座，出土的大量太监墓志，为明代宦官研究提供了诸多史料。我馆藏明代太监墓志实物计有二十余方。

1980年6月北京西郊香山出土了《刘忠墓志》。志主刘忠是明御马监太监署乙字库事，号栖岩，广东人。九岁入选内廷，任孝宗、武宗、世宗三朝近侍太监，在宫中达五十九年，生前“特赐蟒衣玉带”。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葬于“都城西香山乡慈感庵义茔”。

对于明代宦官之研究，近年来不断深入。《北京文物与考古》2004年第六辑登载了《明御用太监赵西漳墓志考》^⑤，文章对墓志所载赵西漳的生平进行了详细考证。赵西漳历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七岁即割阉入宫，武宗时在内馆读书，世宗时任御用监太监、特赐飞鱼、斗牛、蟒衣、玉带、绸叠祭玄帝于太和山，监理敕封朝鲜国，任凤阳皇陵守备；穆宗时留任凤阳守备；神宗时管甲字库，教宫内经书，掌宝和皇殿，提督南海子等职，是明朝太监中极为风光者。此墓志内容可与《明史·宦官传》互相补益并补其不足。

《北京文博》2006年第2期发表了郝黎《再论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该文利用相关墓志材料，对宦官教育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任昉女士因参与《新中国出土墓志》大型丛书的编辑和审定工作，利用获见的一些明代宦官墓志对明代宦官的籍贯与民族、选用与仕进、退休与养老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著文三篇分刊《首都博物馆丛刊》15至17辑。

明代墓志中涉及任职锦衣卫者也颇多，《张爵墓志》就是其中一例，该墓志1957年于永定门外蒲黄榆第三师范学院出土。张爵本为兴献王府的一名臣仆小吏，后逐渐成为嘉靖皇帝

深信的宠臣，官至锦衣卫管卫事指挥使。其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对研究明代北京城坊胡同极具帮助。吴梦麟先生所作《明〈张爵墓志〉考》³⁴一文，对该墓志进行了考证，内容包括张爵的身世、著作及对此墓志的几点认识，对研究明代锦衣卫的构成状况、荫封、世袭等制度极有价值。

明清时期因受葬俗习惯之影响，出现了许多家族墓地，因此也有一些具有影响的家族墓志出土。如明代武定侯郭氏家族墓志、明代郑承宗家族墓志、清代词人纳兰成德家族墓志等。

郭氏家族墓志现藏我馆，共三方，包括《郭玘墓志》、《郭守乾墓志》和《郭守乾夫人谭氏墓志》。《郭玘墓志》1999年怀柔县红螺寺西出土。郭玘为武定侯郭英之孙。因其姐为明仁宗贵妃，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袭侯，正统九年（1444年）镇宣府。《郭守乾墓志》和《郭守乾夫人谭氏墓志》1982年海淀区中央团校南出土，郭守乾父郭勋袭封武定侯，进太师翊国公。十六岁其父谢世后闭门潜修，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袭父爵武定侯，屡领军府。死后其子郭大诚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袭侯。其妻谭氏为宁新伯谭论之女。

清代纳兰成德家族墓志在1972年至1973年间陆续出土，共计九件，包括《纳兰成德墓志》、《纳兰成德夫人卢氏墓志》、《明珠墓志》、《明珠夫人觉罗氏墓志》、《纳兰揆叙墓志》、《揆叙夫人耿氏墓志》、《纳兰揆方墓志》、《纳兰揆方夫人觉罗氏墓志》和揆方嫡子《永寿墓志》。赵迅先生据此九件墓志为第一手资料，结合文献对明珠家族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书《纳兰成德家族墓志统考》，由北京文津出版社在2000年12月出版。

北京出土的清代墓志要比明代少，1952年9月海淀区车道沟出土的《洪承畴暨元配李氏合葬墓志》较为重要。墓志长88厘米、宽85厘米，周祚撰文，吴正治书丹，黄机篆盖。洪承畴原为明代重臣，松山战时被俘，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降清，他在明朝时为官二十六年，用为重臣十二年。降清后，为清廷提出诸多有效统治方略。墓志的出土对研究洪承畴

及明清史极有帮助。

1962年7月西城区小西天索家坟出土的《黑舍里氏圹志》镌刻精巧是清代墓志中少见的。志石汉白玉石质，通高98厘米，宽28厘米，厚9厘米，碑形。阳镌满文，阴镌汉文。沈荃撰文并书丹，冯源济篆额，刘源填朱。首题“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铭”。黑舍里氏法名“众圣宝”，在世仅七年。祖父即清光禄大夫辅政大臣一等功索尼，父即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北京考古四十年》³⁵载，其墓用料精细、做工考究，墓室中三座壁龛为仿明式建筑，随葬品有瓷器、玉器、铜器等，皆是当时传世珍品。

《王熙墓志》海淀区魏公村出土，现藏我馆。熊鹰女士的《王熙墓志考——从王熙墓志谈王熙》³⁶一文，对志主所处时代和清代统治者的用人政策、王熙在清初政治舞台上所起的作用和对其评价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王熙是清初顺治、康熙两朝的重臣，其墓志对清史文献有补阙之用。

民国时期墓志在北京出土甚少，所见研究者更甚，幸见《英年早逝的民国将领——从胡景翼墓志谈起》³⁷一文，对这位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的爱国将领之生平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此墓志由著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撰文并书丹，对胡景翼的一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邀请著名书法家吴昌硕篆盖，由精于刻石的琉璃厂翰茂斋李月庭勒石。胡景翼卒后葬于山西华山王猛台下，墓志本应运往山西，但却不知因何原因滞留京城，后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另一件值得关注的民国时期墓志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于1996年5月31日在西城区按院胡同49号征集的《王妙如墓志》，此志盖篆书“王妙如女士之墓志铭”，志文首题“王女士妙如墓志铭”，闽侯陈衍撰文，蒲圻张海若书丹并篆额，北平陈云亭勒石。志文以隶书勒就，存31行，满行32字，共计908字。志主王妙如，字一真，别号云中，大同人。自幼家贫，四岁丧母，十四岁时至平定李素处，侍其妻梁夫人，被收为笪室。李素，字位斋，亦名畏斋，平定娘子关东口村人。

清末举人，曾任清政府咨政院议员。民国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代表、参议院议员。民国六年（1917年）追随孙中山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至广州，时王妙如也伴其侍候，“奔走于越、桂、滇、黔、巴蜀间”，历经艰难困苦。期间在广州时，专攻诗文书画，作品笔力苍劲，无闺阁之气，为时人所乐道。护法运动失败后，归京定居，“肄业艺术学院，专心书画”，师从齐白石等书画家。“初毕业，书画即有名，于时求者踵至”，其书法无所不佳，画无式不精，为古今才女之罕见。康有为称其书画“直逼卫夫人、黄俊贤、齐白石”。时李素欲在家乡构建一座高小学堂，尚资金短缺，妙如“愿鬻书画助成之，积劳体敝，卧病四稔，遂以不起”，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病故于北京，年三十七岁。墓志文未载其葬地，说明撰写墓志文时葬地还未确定。近年曾闻听王妙如归葬于山西，刊刻好的墓志不知为何却留在了北京而未得下葬。

综上所述，可见北京出土的历代墓志为北京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许多研究者以此为据也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愿这些成绩会使我们今后对墓志这种特殊的石刻文物所蕴藏的珍贵史料价值更加关注，并利用它为历史文化的研究做出更多成果。亦鉴于北京出土墓志所包含的丰富史料价值，适逢我馆西展区“金石走廊”修葺一新之际，选择所藏不同历史时期较有代表性且志石书体佳尚，保存完好者，精心拓制，成此《北京地区墓志拓片精选展》。意为通过展览使观众对墓志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能有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为使展览内容详尽成此图录，文中参阅同行前辈诸多研究成果列于其上，简述北京出土墓志及研究概况。因学识能力和时间所限，诸多学师所著未及拜读，此甚遗憾，所至漏错，还望见谅，诚请诸师斧正。▲

王莘莘

2012年11月19日于京西五塔寺

注 释：

- ①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
- ②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
- ③ 郑仁：《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清理简报》，引自《文物》1965年第12期，文物出版社，1965年。
- ④ 邵茗生：《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释文》，引自《文物》1966年第2期。
- ⑤ 川合安：《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について》，引自《唐代史研究》第4号，2001年。
- ⑥ 王素：《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前言，文物出版社，2003年。
- ⑦ 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 ⑧ 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再探》。引自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第9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 ⑨ 鲁琪：《唐幽州城考》，引自《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北京史研究会编，1982年。
- ⑩ 于德源：《唐幽州村乡补缀》，引自《北京文博》1999年第4期，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
- ⑪ 鲁晓帆：《唐幽州诸坊考》，引自《北京文博》2005年第2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 ⑫ 陈康：《唐代幽州蓟城里仿、村乡之我见》，引自《北京文博》2006年第1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 ⑬ 鲁晓帆：《唐姚子昂墓志考》。引自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第8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 ⑭ 陈康：《试论北京唐代墓志的地方特色》，引自《北京文博》2005年2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 ⑮ 鲁晓帆：《唐幽州经济的佐证——两墓志考辨》。引自《首都博物馆丛刊》2004年第8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 ⑯ 洪欣：《唐〈王时邕墓志〉、〈阳氏墓志〉考》。引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 ⑰ 徐自强：《张建章墓志考》，引自《文献》1979年5期。

- ⑱ 佟柱臣：《〈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引自《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创刊号。
- ⑲ 赵其昌：《唐〈张建章墓志〉续考》。引自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2004年第18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 ⑳ 陈康：《杜恂与韩氏家族》。引自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2002年第16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 ㉑ 陈康：《辽杜恂墓志补证》。引自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2004年第18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 ㉒ 赵福生、王武玉、袁进京：《金代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引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83年。
- ㉓ 苏天钧：《后唐北平王赵德钧》，引自《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
- ㉔ 周峰：《辽代〈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铭〉考释》，引自《北京文博》2003年第3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 ㉕ 于德源：《辽南京〈燕京〉村乡指辨》，引自《北京文博》2001年第1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 ㉖ 齐心：《金蒲察胡沙墓志铭考释》，引自《北京史论文集》第1辑，北京史研究会编，1980年。
- ㉗ 陈康：《金代赵公墓志考》，引自《北京文博》2004年第4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 ㉘ 王丹、王策：《元左丞相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文物展巡礼》，引自《北京文博》2000年第4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 ㉙ 侯璿：《元〈铁可墓志〉考释》。引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2月。
- ㉚ 黄秀纯：《元代张弘纲墓志及其事迹考索》。引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 ㉛ 刘精义、鲁琪：《明代妃嫔陵园及圻志》，引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 ㉜ 苗天娥：《光庙恭懿庄妃圻志略考》，引自《北京文博》2005年第3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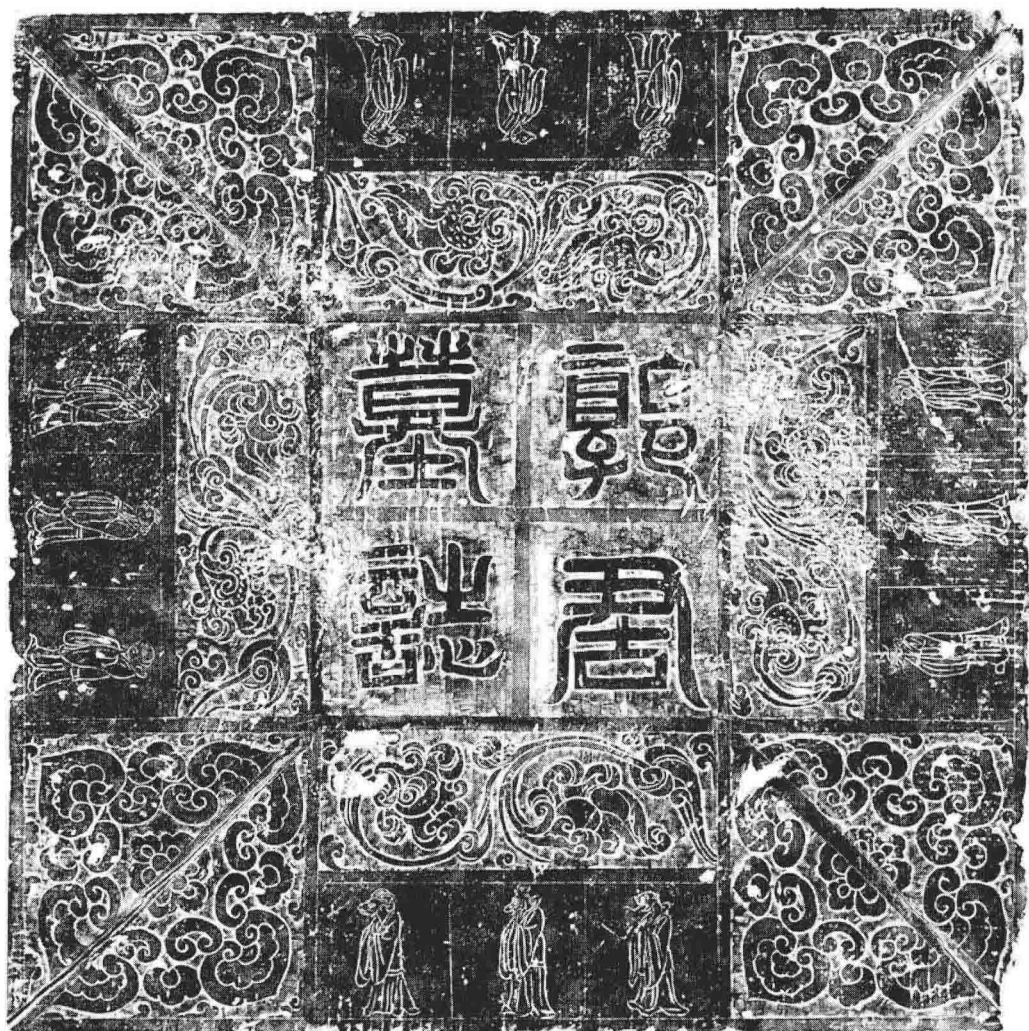
- ㉝ 王清林：《明御用太监赵西漳墓志考》。引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 ㉞ 吴梦麟：《明〈张爵墓志〉考》。引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 ㉟ 北京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 ㊱ 熊鹰：《王熙墓志考一从王熙墓志谈王熙》。引自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2000年第14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 ㊲ 葛建军：《英年早逝的民国将领—从胡景翼墓志谈起》，引自《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唐代墓志

北京地区出土唐代墓志相对较多，我馆目前藏有唐代墓志拓片 51 件。时间自唐上元三年（676 年）至唐天祐四年（907 年）前。内容涉及时任幽州重要官员者颇多，对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幽州、卢龙藩镇情况具有实际价值。墓志大多还对志主宅邸、葬地记述详细，是确定唐幽州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据。

形制上多为盃顶式盖，四刹线刻不同形式的十二生肖，四角饰不同花纹。盖顶多镌四字，称“某公墓志”。志石边框线刻简单直线、双线或回行纹。字间或为横竖，或为竖向界格。■



唐郭君墓志盖

唐郭君墓志并盖

唐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十三日卒,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七月二十日葬。墓志为一盒,长、宽均77厘米。1981年11月北京市海淀区钓鱼台东门以北(今三里河路东侧)出土。

志盖盖顶式,四刹线刻人身兽首十二生肖,四角如意云纹,篆书“郭君墓志”四字。志文正书,存24行,满行25字,共计511字,字间刊横竖界格。因志石右上角残缺,郭君名讳不可知,

郭君为燕人,善词文。卒于唐开元十七年(729年),享年67岁,志载葬其于“蓟城北丰乐乡”。志文撰者王利贞时为梁州城固丞,为当时词人。▲